



成都的雨

希冀

从成都回来。
抵大同那天,我把成都的雨也带回了。好像北方的春雪是忽然间湿润软了的。
我想描述的一切都与成都的雨有关。

成都三月的雨,是母亲筛米糠的竹簸箕,把豌豆苗的清气与竹笋的滋味细细洒下来……春熙路的夜晚虽然那么繁华,但雨一来就不一样了,万物渐渐静下来,雨点那么轻,让你的脚步也不得不慢一些,静一些。

敞门的店铺,有摊主喊你避雨的川音,雨一样绵软亲切。和我岁那年一家随母回川,亲戚乡邻喊我们到家里做客的声音一样——“稀客来喽!”喊罢后,就要为你煮一碗热腾腾的糖水鸡蛋祛湿驱寒。

二

在四川张家湾,雨水是有形状的。它们沿着青瓦屋檐垂成珠帘,母亲蹲在檐下剥新笋,指甲盖里嵌着春泥。我总疑心她粗糙的掌纹里藏着微型梯田:食指是晋北南家堡旱地皲裂的沟壑,小指蜷曲处却蓄着蜀南未说完的梅雨。那天午后,她拔兔草归来时,蓑衣滴落的水珠砸醒泥土里沉睡的野豌豆,爆出嫩芽的脆响,二十年后来叩我的窗。

18岁高中毕业,我又随母亲回川。列车上,她替我揩去车窗雾气。

三

急诊室的心电图像像竹筛漏下的雨脚。母亲临终前指尖悬在空中,草汁正从指甲缝渗出墨绿的星轨。

我忽然明白她为何总在雨后攥紧衣角——那些未拧干的蜀地云烟,此刻正从奖杯底座漫上来,漫过她给我未纳完的半只鞋垫上;漫过豌豆苗在记忆里攀援的须蔓;漫过小时候我歪

歪扭扭替她写的一封寄往家乡的信里;漫过现在我写的每一行诗中……

锦江水汽打湿了领奖词时,有竹笋在地下拨动时针。倒春寒从我上台时穿着的漂亮薄衫里漏出风,裹着那些年母亲到水库植树时,往井口担水时打湿的裤脚凉。水晶杯壁滑落的不是雨,是她采回兔草时,从蓝布衫袖口抖落的狼藉草籽——它们正在我诗行最湿润的字句里,噼啪炸开春天。手捧奖杯那一刻,我忍住泪水,却在心底一遍遍呼喊:妈妈,如果你能等到这天有多好。

四

成都的雨是软的,渗进杜甫草堂一条竹径的青砖缝里。草堂里昏暗的油灯也是软的,雨的光和灯的光,更像是杜甫诗文里“下者飘转沉塘坳”的那一撮茅草,阐释了一种生活状态:可以柔软,可以无奈,可以随波,但不可以无怀无骨无爱。

杜甫,是这样的人,巴蜀大地尽是这样的人,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人。她和那些年众多去异地谋生的四川人一样,成为当地人口中吃苦耐劳的代名词。

母亲能挣一个半人的工分,母亲和父亲一起盖起了村里的三间红瓦房,母亲沿街卖冰棍、卖油旋、捡菜叶,母亲种地、站柜台,打算盘、绣花、养兔……

从四川走到山西
从水渠边洗衣的小幺妹
走成干沟梁挥镰的老伶子
母亲必须有一双大脚板
她的脚印,圪坡坡上的
蒿子草一样,背着一座山
爬满另一座山

(选自《母亲有一双大脚》)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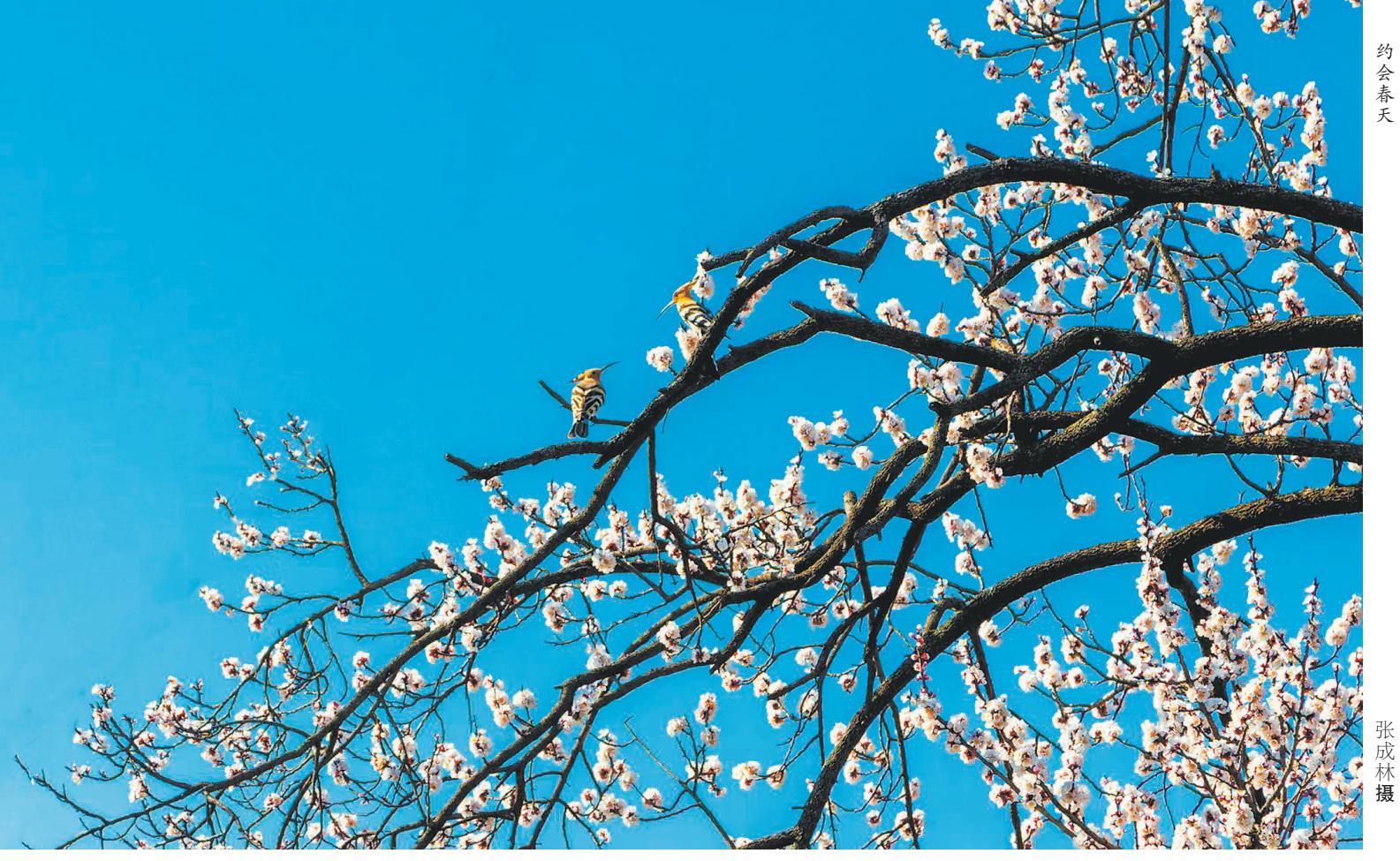
在四川报业演播大厅的领奖台上,射灯亮起的刹那,我恍惚看见母亲沾着草汁的手——那些绿渍从指缝渗进奖杯曲面,我甚至感觉到母亲就在台下看着我,她笑着说:妈是晓得的,你终会替妈回一趟四川。

领奖台下的掌声漫成潮水时,我摸到衣兜里硬质的车票存根。那些绿皮火车翻过的山,山顶的星光,和成都的雨滴,都终究会在诗行里搭成通行的梯,接回某个迷途的春分。

成都的雨,是母亲未纳完
鞋垫上的针脚

她要绣的图案,需要我
用诗行来解读
我和她隔着
一个春天的潮湿
相拥

(选自《成都的雨》)



张成林摄

老屋,老院

郑建国

几块铁条。院中间还修起一座花坛,每到夏秋两季,花池里种植的各种花卉相继开放,我们种过像牡丹花一样的萝卜花、扫帚梅、小菊花等,给整个小院增添了些许艳丽的色彩。

祖辈的大院生活

我爷爷那一代兄弟四人,除三爷爷年轻时在煤窑挖煤出了意外不幸去世外,其他兄弟三人均在这个大院成家立业,繁衍生息。那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当家,过着大家族集体生活。我爷爷主要是外出在别的村当长工,四爷爷在本村打短工,大爷爷负责耕种自己家的土地和料理家务。我的大爷爷和四爷爷住正房,我爷爷住西房兼伙房。据我父亲讲,他小时候就是住在西房兼伙房,冬天,一大家子人到了点儿都去吃饭,这个走了那个进去了,门窗还不严实,再加上没钱也没有安置个火炉,被子又破又薄,一晚上冻得睡不着;到了夏秋两季,天气也热了,可伙房每天要烧三顿饭,把炕烧得烫手,躺在炕上烫得不停地翻身,再加上当时卫生条件也不好,人多进出频繁,苍蝇乱飞,臭虫乱窜,扰人心烦,正常入睡更难。就是这样艰苦的日子,也培育了我父辈七个男孩两个女孩,成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

父辈的大院生活

我父亲这一代,在这个大院生活时间最长,也是人口最多、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据我父亲讲,他小时候由于自家的土地数量少且地质不好,每年打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家子人口吃,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那时,我大爷爷家育有两个女儿一个男孩(是我爷爷过继的,我们称叔叔),我爷爷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寄奶后未要回),我四爷爷两个儿子。女儿外嫁,男儿当婚,原来爷爷辈兄弟四人到父辈兄弟七人,兄弟七人相继承家,让大院变得更加拥挤,但大院的人

气更旺了。

我父亲是他这一辈男性中最大的,兄弟四人相继成家,按祖辈分到我爷爷名下的房子也不多,我父亲成家时住在正房西两间,我二叔、三叔两家在西下房,每家一半,到我四叔成家时已没有房子了,在我父亲的倡导下,兄弟四人自己动手,齐心协力,挖土填坯,起石头,烧石灰,自己实在做不了的活计就请匠人来帮忙,终于在院东南角原来的那片菜地盖起2间窑房,这也成了我四叔的婚房。那时我的奶奶还活着,我四叔和我奶奶就住在新盖的窑里。兄弟四人窑房也落下不少饥荒,也是为了我四叔成家,我父亲兄弟四人对原来住的房进行了重新分配,住大一点房还要平摊一点钱。后来,随着各家经济条件逐渐转好,我的父亲还给各家都画了围墙,锅台上画一幅大的,有“富贵牡丹”“前程似锦”“花好月圆”等图案,炕墙上画月季花、牡丹花,还有小桥、流水图,中间画的勾连万字纹立体感非常强,当时也让全村的村民“眼红”不已。

我读小学的时候,二叔在村东梁批宅基地盖起了三间平房,搬出大院,我三叔也根据当时的政策办理了农转非搬离大院,我们的住宿条件大为改善;我四叔一直住着自己的窑房,我的叔叔一直在正房坚守祖业。在二叔、三叔搬走以前,大院里生活着5家人家共有29口人,这是大院里的人口鼎盛时期,当然也是住房条件最紧张的时期,但也是大院里的孩子们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经常端着饭碗这家出来那家进去,吃完饭相互叫喊着名字出去玩耍。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每年春节全旺火,每家出一箩筐炭,在花池北面垒一个大旺火,我父亲兄弟四人用一下午时间才能垒好,再用剩下的碎炭块在花池南面正对着院大门的地方垒一个小一点的旺火,垒好后等到天一黑就点燃,孩子们从年三十晚上点燃小旺火后就围着小旺火玩耍,冷了就跑到小旺火跟前烤一

烤手,烤得不冷了就再去玩,这也让附近大院的同龄孩子们羡慕不已。到1984年我家和四叔一家一起搬进县城,整个大院只剩下我叔叔一家,又过了几年叔叔也搬走,整个大院逐渐荒芜了。大院境况一年不如一年,先是大门倒塌,窑房塌顶,后来是西南房倒塌,西北房倒塌,五间正房塌顶……

我们这一辈的大院生活

我哥作为我们这一代中的老大,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他虽然18岁就离开老家到省城工作、生活,但他还是遵循父命,从太原回到老屋举行婚礼,他是我们这一辈唯一在这个大院举行婚礼的,我的大嫂也成为郑家第四代的第一个新媳妇,在这个大院的老屋度过了令她终生难忘的新婚“蜜月”。老院出生,老屋成婚,我哥对这座老院有着更深刻的印象和更多的留恋。每次从太原回来,他只要有时间就想领上孩子们回村看一看,照几张照片。

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那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母亲就让坐在小板凳上煽火,本来在学校已蹒跚了一上午,回到家饭却没熟,还得坐在那里拉风箱,呼嗒,呼嗒,呼嗒……当时觉得那声音简直就是最难听的声音了,有时还会因消极怠工招惹,直到有了手摇鼓风机才彻底解放。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共有的经历吧,每每和同龄人聊起煽火的事,大家都有同感。

再后来弟兄们相继搬离,成家也就都不在这个院子了,对老院、老屋的情感有些许减弱,只是偶尔回去看一看,站在各自曾经住过的老屋前留个影,和孩子们讲一讲曾经的过往,我想老院、老屋对大部分弟兄来说都成了一种回忆和梦中的一个小片断了。再往后,随着老院的彻底拆除,想回村看一看老院、老屋也成了泡影和奢望,再也无处追寻儿时的那种气息与温暖了……

老屋里的故事,随着老屋的消失随风而去。

老屋里的亲情,随着老人们的离去变成回忆。

老屋,老院,也成为我们这一辈人难以抹去的一丝记忆和难以割舍的一缕乡愁……

新邻居

刘增元

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有山噪鹛做了我的邻居。

你也许会说,院墙外面的灌草丛中,有一对鸟儿筑了巢,值得这样兴高采烈吗?要知道,阳春三月,万物萌发,天地间的氤氲之息鸟儿最先感应,于是成双成对,繁衍后代,寻常之事而已。是的没有错,斑鸠就在我们院子里落了户,红尾鸽甚至在我家南房的卷柜顶子上安了家。可我说的不是房前屋后乃至世界各地寻常可见的麻雀呀,而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儿——山噪鹛。

这种鸟儿体长大约25厘米,全身黑褐色,尾巴很长,这就使得它身材非常苗条,已经算得上是中型鸣禽,还是画眉科鸟类分布最北的一种鸟儿。这种鸟儿害羞且胆小,栖息于山地斜坡上浓密的灌丛中,寻常不大容易仔细观察。它们经常成对活动,稍微弯曲的尖嘴最善于地面刨食,夏季以昆虫为主食,冬天则以植物种子、草根充饥。我认识山噪鹛,最初是在农贸市场,隔着鸟贩子肮脏的铁笼子,我看到它修长的身姿,很有些不情愿地在笼子里窜来窜去。老实说,开始我也没怎么注意它,但一声浑厚、嘹亮、婉转而富于音韵的鸣叫,使我止步不前,仔细辨认,得卖鸟人所说的“灰串子”,正是大名鼎鼎的山噪鹛。如今在我院外崖畔上灌丛里隐藏的一对鸟儿,那嘹亮的鸣叫声,不用看清身影,就能断定它们是著名歌唱家画眉鸟的本家山噪鹛无疑了。

为了弄清楚这对山噪鹛是准备常住天赐沟养儿育女,还是仅仅小憩一番,我攀上崖畔,想寻找它们的窝巢。多年来,这一带没有出现过像样的鸣禽,我所听到的值得欣赏的歌声只有两种,一种是尖细清脆的红尾雀,一种是婉转清晰的凤头百灵,却都不

这么,山噪鹛还真是成了我的邻居了。

参加阳高秋林民俗文化节有感

任义

(一)

六棱山下远人家,
二月东风绿草芽。

(二)

轻车俗客上秋林,
岭雪明窗闻素琴。

(三)

隔水乡间日色新,
幽园曲径远风尘。
民丰物阜多奇士,
人杰地灵少混邻。

料峭春寒犹未止,
流云不阻少年华。

七八佳人山下舞,
老夫又发少年心。

天外六棱浮霁雪,
家中五谷涌珍珍。
闲来歌舞明心事,
唱彻云霄酬上宾。

“匠心”酿酒师周保

刘昌印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雁崖矿调到大同市酒厂办公室,听说周保于1955年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这么重要的事情,让曾从事7年新闻报道工作的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曾几次采访过他,但他很少谈论过往的那些事,只是憨厚地笑着,说:“能被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并合影留念,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荣幸。”

周保1952年一参加工作正赶上大同市酒厂建厂,1953年酒厂建成投产后,他成为一名酿酒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酿酒用的粮食非常紧缺,一般是按照45%的出酒率给酒厂拨粮,每个班900公斤粮食。同时,国家还提倡“无粮造酒”,一是用果类造酒,二是投入原粮要少,出酒率要高。作为酿酒工的周保成天琢磨着如何提高出酒率,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一次他在发酵车间一时出神,不小心滑下两米多深的发酵池中,身上沾满了发酵的控浆水,他看着脏兮兮的两手,下意识地闻了闻手上的污物后哈哈大笑,原来他闻到了控浆水中微微的酒香味。他如获至宝,即刻意识到这些以前被抛弃了的发酵控浆水中含有微量的酒成分,若把这些收集起来再蒸馏,一定可以提高出酒率。

从发酵池上来后,他立即向大技师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同事们的认可。在那些日子里,工人们下班后,他就在白酒车间爬上爬下回收控浆水,生产时将收集起来的控浆水拌入待蒸馏池中进行复蒸,使出酒率有了明显的提高。有人算过账,周保收集控浆水每月给他们这个生产班增加了上百斤的白酒(酒精含量为65度)。这一举措得到了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厂14个白酒生产班推行,每年可增产白酒8400公斤,节约用粮21000公斤。这一消息传出后,周边酒厂纷纷

过来学习取经,也带来非常大的社会效益。尤其是1955年9月20日至28日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后,周保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在全国同行业得到了推广,许多单位邀请周保作经验介绍。同时,大同市酒厂党支部也作出了“向周保同志学习”的决定,全厂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对推动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保被提拔成白酒大技师后,工作更加勤勤恳恳。他坚持辅料清蒸、低温发酵等一系列科学操作措施,并将蒸馏时在甑锅周围用发酵密封改为黄泥密封,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还提高了产量。多年来,周保带的白酒生产班在全厂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60年,他被评为“山西省先进生产者”。

20世纪60年代初,大同市酒厂为度过困难时期,承揽了加工硼砂业务,周保下班后,主动参加了三年的义务劳动。1968年酒厂开始土法上马生产啤酒,周保又利用业余时间往发酵洞里背冰、抬麦汁。1971年酒厂党支部决定新建啤酒酿造车间和灌装车间,他冒着严寒早晚忙碌在工地上,人们称赞说“周保是走在时间前头的人”。

1972年大同市酒厂决定让周保带

领13名职工去河北省宣化钟楼牌酒厂学习,这一任务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新课题,一切都需从头学起。周保一点都不敢松懈,他和同事们一起跟班劳动学习,每个工序、每个环节都不放过。通过两个月的认真学习,他带回了丰硕的成果。1973年6月大同市酒厂正式生产瓶装云冈啤酒,周保被指定为啤酒生产负责人,后被任命为啤酒车间主任。他带领车间职工严格工艺管理,生产出了口味纯正、清爽可口的云冈啤酒,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周保虽已离世多年,但大同市酒厂的老职工还常常谈论起他,他匠心酿酒的严谨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